■专题策划/ 本报记者 徐津阳 彭建楠
采写/ 本报记者 彭建楠
历史系2013级研究生 胡洁莹

长怀伟人 笃志厉行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风雨历程



制图/杨鹏桦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校歌的旋律，中大人再熟悉不过了。四字句式，铿锵有力，颇能振人志气。只是，不知有多少人细细思量歌词，或是了解其背后的沧桑与坚守？比如这一句，“中山首创，遗泽余芳。”孙中山先生为我校的创办者，其于教育事业的殷殷热忱，被泽无数莘莘学子。而伟人无形的遗产，更鞭策着中大走过九十年的沧桑。

从历史的角度说，从辛亥革命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风云激荡，不过是百年复兴的一个进阶。但中山先生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天下为公的精神，早已不受时空的局限，不仅在他亲自创办的这所大学永驻，更溶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去追寻我们的精神血统，是后辈不能忽视的使命与责任，身为中大人更应该义不容辞。



左起：陈胜粦、陈锡祺、姚间乘树、林家有[空]一年，孙中山研究所同事与日本学者合影





舞、林家有教授等合影
日旭先生（居中）率领访问团表访、与陈胜台湾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杨

2004年，孙中山孙子孙治平（左一）向孙中山研究所赠送礼物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实事求是 求真求实

——中大“孙学”研究者的治学品格

中大的“孙学”研究传统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能如此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自要归因于师生的同心协力和海内外人士的鼎力相助，但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在无形中一脉相承的治学品格：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真求实，‘代代相传，永不改变。”我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研究所最重要的学风！”林家有教授频为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大“孙学”研究的底蕴，支撑着它的根深叶茂，宠辱不惊。

方法：搜集材料与专题研究并重

研究者的研究，建立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刚刚开始孙中山研究时，大家都有些茫然无措。林家有教授说，他此前并没有深入了解过孙中山和“孙学”，遇到这种情况的并不只有他一人，新进的研究生更没有多少基础。而陈锡祺教授对于这一点心知肚明，历以，他要大家“先去收集材料！”收集材料是陈教授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任务。研究者集中全力编纂《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全体研究者和研究生深入北京、南京、上海、云贵川及其他地方收集材料。与此同时，陈先生也给大家安排相应的研究课题。林教授至今仍在感叹，搜集材料与专题研究并重，可以算是中大“孙学”的一个特色。“陈教授非常的英明，在开始的一两年，我们整个研究室都在埋头搜集材料。我们的同事李吉奎，他从张北调过来，日语比较好，陈教授安排他研究‘孙中山与日本’。”陈先生也两次抽着病体亲赴东瀛，结交朋友。为了编辑《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我们在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云南档案馆、重庆、桂林、贵阳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进行了普查。林家有、李吉奎、桑兵教授还利用到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深入日本外交档案馆和各地搜集孙中山的材料。**“把材料都搜清楚，我们心里就有谱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专题研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可靠。”**材料收集是集体的任务，至于专题研究，陈锡祺先生则根据不同研究人员的情况给予安排。可以说是各尽其才，比如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陈教授就安排我和周兴樑研究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段云章和邱捷对地方史了解较多，便安排他们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军阀，李吉奎会日语，他就去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在我们的研究队伍里，每个人都能发挥各自的特长，人人有事干，个个有奔头。”林教授说。

立场：坚持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性

只有坚持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性，才有生命力。当然研究孙中山要为国家统一、民主团结等政治服务，但政治与学术不能等同。只有坚持学术的纯粹性，才能发挥作用。林教授说，孙中山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是一位现实人物。两岸四地，海外侨胞，都对中山先生怀有真挚的尊敬，但是情感是情感，真实的孙中山是怎么样，不能盲目地夸大，更不能无原则地丑化。客观理性的研究是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孙中山永恒不变的主题。“过去国民党史研究者，台湾有的学者，他们会把孙中山神化成一个没有缺点的人。而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会随意扭曲孙中山的思想，得出非常离谱的解说。我们不主张这样意气用事，应该就事论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举个例子，孙中山是个伟人，但他让权给袁世凯这件事是一个大错误，他以为按照西方民主宪政，谁当总统无所谓，他不知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要实现所谓的民主则不是你可以想象的结果。对于这一层，孙中山起初似乎不大懂。又比如，他对日本的领导人总是充满幻想，他不止一次地现幼日本同他建立联盟，支持他改革中国，结果错的又是孙中山。还有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缺乏应有的霸气，处理事情有时该断不断。”

其实，中大的几代“孙学”研究者对孙中山都十分仰望，万分敬佩他的理想、毅力和精神，以及对近现代中国的贡献热忱。陈锡祺先生一辈子最引以为豪的事就是从事孙学研究，林家有教授则把孙中山看作一个品格高尚值得全国人学习的楷模，他说：“孙中山生在一个小山村，幼时并不见得很聪明，但他从小有志气，要为国家富强、民族谋福祉，虽一生坎坷，但他从不气馁，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杰出的伟人。对于这样的人不研究，研究谁？”过，研究孙中山当然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学术性，这是必须坚守的信条。“我们不能无原则的乱说，更不要过于意识形态化，只有根据文献材料，把每一件事都研究清楚，将其真实情况弄明白，这才是我们的目的，研究人物当然要加评判，但评判必须符合历史真实，只有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才能服众，才能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很难做到，但必须要这样坚持。因为**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坚定自己的立场，勇于担当，要有历史的使命感，必须肩负起学者的责任。**”林教授说，求真求实的学术标准，已经被孙中山研究所人员一代又一代人默默传承了下来，现在历史系还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等一直一代学者，也都奉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求真求实的准则，“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做人，踏踏实实地教书，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

前路：孙中山研究还有未来

如今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已然蔚为大观，研究孙中山已越百年，研究的范围也很宽广，还有没有问题可以研究？有些人说，孙中山研究已经到顶了，差不多了。有些年轻后辈也望而生畏，不愿再做“孙中山研究”，他们认为，孙中山研究已经很难再有重大的突破。林教授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孙中山研究永远都不过时，他说：“我们习惯把孙中山当作一个民主革命家，之前的研究也多关注其革命活动，但忽略了他实现国家民族富强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国家应先富后强，只有富了才能强，只有强了才有未来。所以要发展实业，要重视经济建设，要实现民生革命，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只有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才会有稳定和谐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正走在复兴之路上，如何建设强大的国家，如何与各国和平相处，孙中山的建设思想在当下仍有普适性的意义，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启迪。**但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学者却忽略了这一块儿。所以，研究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课题。我退休后，重点在研究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和社会建设思想，成书两部，约150多万字。其实关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孙中山的人际关系，孙中山与世界，孙中山革命和护法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后孙中山研究的评论，都还有许多领域可以开拓。”

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是不能否认的，他为国家而奉走，为民族献身，他从政廉洁奉公，甘为人民的公仆，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所以林教授说，孙中山研究始终有其现实意义。林教授强调研究孙中山虽然不能赞扬，却是国家民族的大事，中大人也不是为个人的目的而重视孙中山的研究，而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林教授鼓励年轻人能够继承“孙学”的学术薪火，勇往直前。“中大的孙中山研究，经过了几代人不断地积累，已经享有盛誉，但还有许多工作等待年青一代学者继续。2012年孙中山研究所推出了《方couple孙中山研究丛书》（编电汇编），目前又在做《孙中山全集续篇》和《孙中山史事编年》大型资料性工作，我与张磊先生主编的《孙中山评传》这部120多万字的著作也在近期出版了，我们没有拿负国家的期待，我们相信中大的‘孙学’研究依然会有新的成果和美好的未来。”



前缘：外国专家带来的震撼

“孙中山研究从此就在历史系扎根了，再也停不下来！” ——林家有教授

陈锡祺教授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1932年陈先生高中毕业后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陈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四川大学任教，1940年1月返回母校武汉大学，1946年陈先生调来历史系任教。调入中山大学后，陈先生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岭南这块承载近代民主革命热血的土地，很快也激发了他投身全新领域的热情。1955年，苏联专家谢宁一天中大访问，学校领导安排陈教授接待，陈先生陪同谢宁一行到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访问。翠亨村之行，让陈教授的内心尤为震撼，苏联专家对这位中国的民主革命家都充为敬重，中山大学作为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大学，不能不重视对孙中山的研究，陈先生随后即向学校领导报告，建议中山大学加强对孙中山的研究。陪同任务结束后，陈先生又再次探访了翠亨村，向乡里父老问询孙中山青年时代的活动，采取现今“口述历史”的方式，一点点地搜集材料，后来，依靠这批一手资料，他写成《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部孙中山研究专著，至今仍为治史者所重视和引用。陈锡祺教授认此对“孙学”矢志不渝，也开启了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孙中山研究从此就在历史系扎根了，再也停不下来！”曾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的林家有教授回忆。

当陈教授发奋砥砺时，林家有还是一名青涩的大学生。1958年，他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于学中山先生，他并没有过深的了解，但每次在图书馆（即现在的马丁堡）门外排队时，他都会远远地即现中山先生铜像，“那时并没有人瞻仰铜像，我们那中山如何伟大，但大家心里都怀着对伟人的崇敬。”林教授说，在文革时期，一些过激的红卫兵一度想推倒孙中山铜像，历史系的师生就工整地誊抄了毛主席《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贴在了铜像旁，终于使这一尊孙中山铜像始终安然矗立在校园内。1963年毕业后，林家有暂别母校，也让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的研究。林教授坦言，他对于民族学始终没有培养起太强的兴趣，因为他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文化课是中国近现代史，他总期望终有一天能够搞回自己的本行。1976年，中山大学李嘉人校长将林家有调回母校，他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使他能有机会在陈锡祺先生、陈胜粦先生的指引下开展孙中山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工作。

复兴：1978年，中国的孙中山研究有缺许复苏

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中大“孙学”阵地，只有陈锡祺、陈胜粦两位教授孤军奋战，而“文革”期间，老一辈学人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的确，“文革”的风暴让诸多学科都归于停滞和沉寂，但陈锡祺教授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只要时势允许他复归，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披挂上阵。历史自有其公正性，在“文革”还未正式结束时，广东省的相关领导已经意识到孙中山研究的重要，校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恢复被冷落已久的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纪念馆。陈教授参与复馆工作。“当时学校很重视这件事，纪念馆原址就设在现在的保卫处，展厅占了两间大房子。从事孙中山研究不仅要重视学术性，更要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普及，那时老先生们办展览，真是一心一意，每逢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都要向公众开放。”林家有教授说，而参观者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杨尚昆和省长刘仲明同志来中大检查指导工作，还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纪念馆。

仅以纪念馆的形式来昭示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还远未够，中大人更锐意在史学研究上有一番作为。陈锡祺教授被各方委以重任，要组建被时全国惟一的孙中山研究室。陈教授与胡守为教授、段云章老师等人，为了恢复孙中山研究，先后去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搜集跟孙中山先生有关的文献材料，并同中大的老系友、新朋友会面。陈胜粦先生还奉校长李嘉人同志之命北上联系和物色校友和系友回校工作。陈教授从南到北走了一圈，一路上“招兵买马”，曾在黑龙江工作的郭景荣，在吉林省社科院工作的李吉奎，在北京工作的林家有、梁碧莹等，都在陈先生北上之后先后被吸引来的。林家有教授说，刚回到中大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参与检索国教授主编的《简明中国通史》的编写，对于未来的工作还没有确立方向，但陈锡祺、陈胜粦教授总鼓励他回历史系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因为两位先生都是其读本科时特别信赖的老师，他们的召唤，便决定了林家有教授后来的研究和奋斗方向。

1979年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成立，陈锡祺先生任主任，这是当时中国大陆第一个研究孙中山的专门机构。孙中山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孙学”重整旗鼓，而人才的积聚和培养则为中大“孙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在中大只有陈锡祺先生专门研究孙中山，为了培养人才，陈先生把校内云南、王志光等研究生、“文革”后陈先生又招收邱捷、周兴樑、陈剑安、桑兵等研究生，在陈先生的精心培养下，他们都成为有造诣的孙中山研究专家。1979年11月，中大与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广东历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有美国、日本、港台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影响，日本转载了这次讨论会的纪要，并评论说“中国的孙中山研究复活了”。

笃志：为孙中山研究奉献“微力”

“我这一生所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为研究孙中山尽过微力。” ——陈锡祺教授

陈锡祺教授在自己肖像的题词是：“我这一生所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为研究孙中山尽过微力。”陈教授是谦虚而热诚的学者，其实，又何止是尽过微力呢？孙中山研究室成立之初，他就开始运筹帷幄，先是联合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了11卷本的《孙中山全集》，其中第5—8卷由中大独立承担。《全集》后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收录内容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文件，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等等，为世界范围内的孙学研究者提供了权威的文献资料。

与此同时，陈教授又集研究室全部人力，编纂了150余万字的三卷本《孙中山年谱长编》，在1991年交付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年谱长编获得了数个大奖，包括孙中山基金会“孙中山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奖等。而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学者狭间直树教授，还曾极力向日本学界推荐这套年谱，希望帮助中国人摘取日本的学术奖项。“不过，这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由于篇幅的限制，这套书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入，比如孙中山前期和晚期都还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现在桑兵教授又在主持编纂新的《孙中山史事编年》，篇幅题比《孙中山年谱长编》增加不少，尤其是新的材料会大幅增加，那就可以补充年谱长篇的不足。”

1986年，孙中山研究室晋升为孙中山研究所(注：这时因陈先生年事已高，使由陈胜粦先生任所长，1991年改由林家有为所长，2006年林家有退休后由桑兵教授任所长)，此时中大“孙中山研究”的整体格局，已经不是一个研究室能够包容的。除陈锡祺、陈胜粦两位教授外，研究所汇集了段云章、林家有、李吉奎、周兴梁、邱捷、桑兵、乐正、贺跃夫等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以及一批青出于蓝的研究生，一时间可谓人才济济，而孙学考题研究的面向也十分广阔。自上世纪80年代起，研究所的师生相继出版了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为标志的多部论著、专著，如《孙中山与日本》，《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等等。又为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孙中山研究丛书》撰著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等。“陈教授很鼓励大家做专题研究，并鼓励老师带领学生做研究，那学生也会有学生，我们就这样一代代‘繁殖’下来，议题越来越多，队伍也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研究队伍十分团结，这是非常难得的，陈教授常常叮嘱我，“家有同志，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团结好所内的同志。”“这一点我们的确做得很好，虽然每个人从事的题目不一样，但有材料发现都会互通有无。”林教授说，中大孙中山研究所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研究所曾多次举办世界性的学术研讨会，比如1984年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了日、美、法、澳等国的孙中山研究学者与会，2000年，孙中山研究所又与日本创价大学在广州联合举办“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7月为纪念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中山大学与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举办“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陈锡祺、林家有教授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同仁编辑出版《孙中山研究论丛》16辑，陆续刊出国内外一些孙中山研究的最新成果。

林家有教授说，陈锡祺先生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奠基者和指引者，他一生都在为孙中山研究做奉献。在晚年时，他头脑已经不太清楚，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但一提起孙中山研究，他却脏脏伴伴说得分分明明。林教授经声验色地追述陈先生带领大家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往事，把笔者一同带回到那个笃志拼搏的年代。或许，孙中山研究所的成绩已经被写进学术史，成了客观的陈述，但亲历其事者，仍旧能听到学术文字背后跳动着的脉搏。

中国心：海外华人也关注大陆的“孙学”

“黄埃头，曾汉民两位老校长都曾对我说过，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学校，作为中大人，不能不研究孙中山，研究孙中山，弘扬孙中山的精神，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华侨、校友办好中山大学的巨大推动力量。中山大学应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家有教授

似乎是自然而然，孙中山研究和中山大学融为一体，中大人走到哪里，他乡的知交总会问起孙中山先生和学校的渊源，中大的老校长黄焕秋、曾汉民去外国和到港、澳、台地区交流访问，都要把孙中山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论丛》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背上飞机，作为礼物送人。

在一般的海外友人当中，孙中山也享有极高的声望。林教授说，许多华侨来到中山大学参观，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中山铜像前肃穆敬礼并参观孙中山纪念馆。孙中山为了追求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鞠躬尽瘁，在远离故土的炎黄子孙心中，他就是一位激励他们雁系“中国魂”的伟人。“孙中山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一个现实人物，我们讲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都不能绕开这面精神旗帜”林教授说。中山大学为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唯一一所大学，爱国华侨中有不少人都曾在孙中山精神的感召下来中大读书，或在孙中山的爱国情感激励下支持中大的建设和发展。据林教授介绍，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建起历史系大楼“永芳堂”的爱国华侨姚美良先生，他的父亲姚永芳是马来西亚爱国华侨，经常用孙中山的爱国精神教育儿女，他的父亲就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崇高敬仰，爱国华侨同胞对孙中山除了缅怀和追思，更关注孙中山研究。作为“孙学”主阵地之一的中大，也受到了他们殷切的瞩目，并给予了极大支持。林教授介绍，他们需要去日本、东南亚等地寻访相关的文献记载，当地的华人每每慷慨解囊，日本神户陈德仁先生多次邀请陈锡祺先生、林家有、邱捷教授赴日本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不仅帮他们安排全程考察旅费和食宿，还向当地政府的档案馆、高等学校和中山纪念地提前做好申请，研究所的同事们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加中山大学系友会和考察也得到当地华侨和华人学者的大力支持。正是这种围绕“孙中山研究”的共同努力，不仅提高了孙中山研究的水平，也把散落在天涯的华人、华侨都凝聚了起来。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知交：四海之内皆同道

“你们这个地方（指孙中山研究所）是真正在研究孙中山，对于外国人也是一个启发。”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

中国大陆孙中山研究的主要阵地在广东，在中大，这是学界的一种共识。林教授讲起了一个故事，曾有人请湖南师范大学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前校长林增平先生评审一部书稿，题目叫做《孙中山大传》，他当场拒绝了，因为在他心目中，孙中山的“大传”只有广东才有条件撰写，因为广东有一批又一批的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孙中山的全面研究，只有他们有发言权。即便在海外学界，中大的孙中山研究所也赢得了同道的尊重。像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在他任孙文研究会会长时，总是留心把孙中山研究所同仁的学术成果和讯息，以最快的速度在他们的《孙文研究》向日本传播。孙中山与日本的渊源颇深，在日本不仅保存了大量孙中山的档案，各地还散落了不少孙中山的书信、电函等，狭间教授，还有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等学者，一旦发现了新材料，也会即刻寄给孙中山研究所，林教授说，中日之间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交流是最多的，日本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学者，如岛田虔次、野泽丰，还有山口一郎、横山英、久保田文次、藤井昇三、中村义，山田辰雄，中村哲夫和安井三吉等一批著名学者都与中大孙中山研究所建立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他们不仅都来中大参加过学术会议和访问，林家有、桑兵、邱捷、李吉奎教授也多次应邀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考察和做访问学者。这种友谊持续了多年，至今交往仍继续不断。1979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韦慕庭（C.Martin.Wilbur）以及女铁郎、德国的金德曼和台湾的吴相湘、蒋永敬、杨日旭，香港的王德昭等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都先后来中大孙中山研究所访问交流或参加学术会议。1995年后，我们又同台湾的国父纪念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大学、台湾大学、高雄中山大学、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机构建立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这些对于孙中山研究所的发展壮大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

日本的狭间直树曾多次告诉林教授，“你们这个地方（指孙中山研究所）是真正在做孙中山研究，个个都是在用心做学问。”孙中山研究所赢得了海内外学界的尊敬和赞扬，除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环境外，与国内外许多学校和学者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孙中山是全世界都重视研究的伟人，“孙学”也由“险学”变为“显学”，当今研究孙中山已四海之内皆有知交。



台湾知名近代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左二）与陈锡祺教授接受会面

“立志做大事 不可立志做大官”

——林家有教授谈孙中山与中大精神

“做大事”的意义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视察广州岭南大学，在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希望学生学好本领，担负起建设国家的责任，他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他希望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什么叫做大事？他说：“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学生立志做大事，就是要求学生为民、为国去求学读书，而不是为了一己的前途，这是新旧教育的最大区别。孙中山期盼青少年从小立大志做大事，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为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

中山精神与中大校风

林家有教授在《孙中山与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办》一文中论述中山精神与中大校风时说，

邹鲁说过：“要革命不能不读书，要革命非有“学问不可”，“重视学术，讲求科学性”。邹鲁曾任广东大学的校长，上引邹鲁的话，是孙中山的思想，也是中山大学的灵魂，同时是中山大学的本色和精神。孙中山手创民国，手创广东大学，从广东大学时起形成的中山大学校风，学风都深受孙中山的影响。中山大学是革命的产物，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这便决定这所大学跟中国的民主革命和建设中国的未来有关。中山大学也一直秉承着孙中山题写的校训和他的教育思想办学。孙中山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立志做大事，救国救民，忧国忧民的办学主张，逐步成为中山大学的校风、学风，以及中山大学精神的源头。

铭记校训

孙中山为广东大学亲笔题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寄托了对中大人的殷切期望。“博学，审问”是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积累知识；审问就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只有不断地疑，不断地问，才能发掘真理，这是学生求学，问学的过程，是学生学术积累的过程。“慎思，明辨”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体现了做人的标志，是完善个人人格的过程；“笃行”是“博学、审问、明辨”的行动和目的。学、问、思、辨都是为了行，要把自己的学问、理论付诸实践，转化为现实，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勇于担当。90年来，中大人一直遵循孙中山提倡的办校精神在奋斗，这也是中大人努力钻研学问，培养人才，爱国家、爱人民，为民族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源泉。

孙中山研究所大事记

●1978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成立。

●1979年11月，与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广东历史学会联合举办“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美、日和港澳台、大陆学者参加，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性孙中山研究学术会议。

●由陈锡祺教授等人，与广东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11卷本的《孙中山全集》，1981年起《全集》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3年至2000年编辑出版《孙中山研究论丛》16辑。出版“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书10部。

●1984年11月，与广东省历史学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日、美、法、澳、韩等国的研究者和中国两岸四地的100多位学者与会。

●1986年，孙中山研究室晋升为孙中山研究所，举办全国性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讨论会。

●1991年，集体合作编纂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先后获国家教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奖；孙中山基金会优秀著作一等奖。

●先后于1992年、1994年两次举办“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三地的学者外，日本、韩国、越南、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国的学者也参加会议。

●1996年以来，完成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版了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为标志的专著多部。

●2001年，与日本创价大学举办“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武汉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合作举办“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研讨会，会后由中大学出版社出版会议论文集。

●2004年，中山大学与广州文化局联合举办，中大孙中山研究所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承办，为纪念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两岸四地100多位孙中山研究学者与会，会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看清世界与正视中国》会议论文集。

●2012年，桑兵教授主编的《各方政孙中山电汇编》10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孙中山研究所列入学科建设规划的重要史料编辑成果。

●2013年，林家有教授的《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吉奎教授的《龙田学思项宫—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邱捷教授的《翠亨实学新论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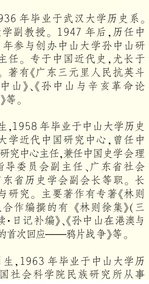
●2014年，林家有、张磊主编的《孙中山评传》，林家有教授和他几位博士生合著的《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修订本），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兴樑教授的《与时俱进的爱国和革命家孙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赵立彬教授，谷小水副教授的《辛亥革命与新中国》，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整理/胡洁莹）

历任主任、所长简介 孙中山研究室、所



陈锡祺



林家有



陈胜粦



桑兵

陈锡祺：1912年生，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金陵大学讲师，四川大学副教授，1947年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1978年参与创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并担任孙中山研究室主任。专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有《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等。

陈胜粦：1937年1月生，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90年参与创办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专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与人合作编撰的有《林则徐集》（三种）五册，《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对西方挑战的首次回应——鸦片战争》等。

林家有：1937年10月生，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197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76年至今在中山大学任教。曾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孙中山基金会副会长，孙中山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的人物与思想。代表性的孙中山研究著作有《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合著，中山大学2014年修订本），《孙中山评传》（主编之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2014年再版）等。

桑兵：1956年3月生，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文化。代表性著作有《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整理/胡洁莹）